

譯者前言

翻譯有兩難：一是神學著作的翻譯，二是詩歌翻譯。關於前者，在《哥林多後書》中就說得十分明白，「翻譯是褻瀆神明的」(Translation would be blasphemy)。¹中世紀以前，《聖經》的語言是神聖和神秘的，它包含了上帝的啟示，翻譯幾乎有為上帝代言之嫌。因此，要是將它從一種語言轉換到另一種語言，無疑是一種邪惡的行為。故「不可譯論」最早是出現在神學翻譯之中。即便到了中世紀以後，不可譯論已失去其昔日的權威性，但人們仍然普遍認為，在兩種不同語言的語義體系之間，很難有真正意義上的對等。宗教翻譯的過程必定存在損失，原文中奪目的光彩和迷人的魅力都會在譯文黯然失色，神聖和高雅也會變得十分的俗氣。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對不可譯性有一種妥協的說法：「我們談到一個人的生活經歷時，即便是人們已經都已把它忘卻，它只存在於『上帝的記憶』之中，我們仍然說它是『無法忘卻的』。與此類似，有些著作，人們現在尚不能翻譯，但是將來在徹底理解的情況下，語言障礙被消除，翻譯仍是

1. 參照G. Steiner, 《巴別之後》(*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Lond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當中提到《哥林多後書》十二章4節有記載，翻譯是褻瀆神明的。猶太教更是明令禁止的。據說，第一世紀有過記載，把《戒律》譯成希臘語時，黑暗籠罩全世界達三天之久。

可能的。」*

上述種種說明了翻譯神學著作的困境所在。不少神學人員或神學研究者對神學的翻譯持謹慎的態度，可十年前，劉小楓博士約我翻譯此書時，自己竟全然不知深淺，一口應允下來。翻譯工作開始後，問題便紛紛冒出來了。合譯者中，有人退出，有人出國，有人已不在學術崗位上，而我自己在很長一段時間也是集行政、教學、科研於一身，這種種原因給翻譯帶來困難和障礙便可想而知，翻譯質量自然也難以得到保證。然而，最困難的還不是這些，而是對神學這門學科的把握。就拿一個術語來說，稍稍疏忽，就可能釀成大錯，如果缺乏相關的知識，譯文就很可能不堪卒讀。記得四年前，第二稿從香港退回時，幾乎給了我當頭一棒。數人合譯，良莠不齊，文風不一，編輯與審稿者自然望而卻步。然而，要再聚齊譯者，幾乎是不可能了。由於偏見和狹隘，翻譯的回報遠遠無法與譯者付出的勞動成正比。沒有價值的論文和書刊充斥市場，而學術精品的翻譯卻大大匱乏。現在還能有幾人心如止水，靜坐翻譯呢？我曾有好幾次產生過放棄的念頭。現在還能有幾個人能沉下來做翻譯呢？幸虧此時我得到了出國訪學的機會，贏得了一段寶貴的自由時間。這是我第二次來到了耶魯大學。每天早上，我會去斯特林圖書館。進門能見到廊道盡頭的牆上聳立聖母馬利亞的雕塑，廊道兩側高大的拱形花窗上的圖案在敘述《聖經》的故事，就連廊柱亦不例外，就是在這樣一種神聖的氛圍和宗教情懷中我進行神

* 這段引文出自Walter Benjamin，〈譯者的任務〉(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載Marcus Bullock & Michael W. Jennings編，《本雅明選集(卷一)：1913-1926年》(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I, 1913-1926; Trans. Harry Zoh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1996)，頁253-263。——譯注

學著作的翻譯工作。坐在圖書館裏，面對一大堆參考資料，每天的任務是先完成翻譯或校譯三頁，再做學術研究。在哈克斯塔的洪亮鐘聲與教堂的悠揚樂曲的交響共鳴中，時間一天天過去，譯稿一頁頁出來，看着看着，我心裏感到十分的輕鬆和超脫。我高興我最終戰勝了困難，把這部約四十餘萬字的神學譯著大部分整理出來了。我不指望這本書會給我帶來很大的回報，對學者來說，學術的價值不在於金錢，而在於學術本身。

最初參加本書翻譯的除本人外，還有三人。但由於此書係神學界泰斗卡斯培的扛鼎之作，也是神學界最重要的學術著作，所以出版社在幾次審稿時，先後將一些存在質量問題的譯稿撤去了，這不是我本人願看到的。現在大家讀的譯著，第三部分由香港出版方另覓譯者重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譯注以及英漢語人名對照表等，均由羅選民完成。耶魯大學基督教中心的邦克 (Jonathan J. Bonk) 先生對我的翻譯工作表現出極大的興趣，申請經費促成我去芝加哥鹿田市三一大學參加「北美華人神學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謹在此表示對他的感謝。我的學生郭欽、彭甯、張建等幫我做了部分打印和校對工作，在此一併致謝。由於我本人不是神學方面的行家，翻譯中肯定還存在不少的錯誤，我們期盼專家和讀者批評指正。

羅選民
二〇〇四年仲春於清華園

序言

ix

上帝問題是神學的基本問題。本書旨在強烈呼籲給予它以應有的地位。的確，論及上帝問題的出版物並不鮮見。但就大多數情況來看，這些出版物僅限於討論近代無神論。基督教對於上帝——耶穌基督的上帝——的理解，因而還有三一論的認信，常常是作為某種附庸而產生，對所提出的問題也缺乏較深入的研究。當代新教神學顯示出相反的傾向。人們在對「唯獨基督」(*sola Christus*)和「唯獨信心」(*sola fide*)的理解上，顯得比昔日的宗教改革家更為激進，正是在此基礎上，他們努力尋求一種由無神論取向所導致的、超越無神論和有神論的立場。然而，在我看來，這兩種立場同樣站不住腳。對現代上帝問題和近代無神論處境的唯一回答，只能是耶穌基督的上帝和三一論的認信，而後者只有在擺脫現存的含混狀態，使之轉化成神學總體的語法後，方得以完臻。

為此，我追溯並再次研究了教父們和其他一些偉大的教會聖師。我從他們那裏學到的，不是一種枯燥無味的傳統主義，而是一種我們今天幾乎無法想象的勇氣，藉以進行自我的思考。傳統和思辨的更新都是必須的，在當前神學處在十分可悲的蕭條狀態之下，尤其如此。因此，教牧導向的神學，既要深入探討當代人的問題，又要清楚神學之何為，它需要的不是較少而是更多的科

學透徹性。教會性、科學性、時代開放性，這三者——而不是別的甚麼偶爾宣稱的東西——是本書得以產生的真正圖賓根傳統。

- x 因此，本書主要面向神學學生，但也同樣考慮到所有對神學中的信仰問題深感興趣的人，如在教會服務的神職人員和平信徒，參與神學討論已成為其信仰組成部分的基督徒，還有日益增多的那些並不信教但當代意義危機促使他們對上帝問題產生新興趣的人。

遺憾的是，在我那本一九七四年出版的基督論專著與現在這本關於上帝論和三一論的專著之間，時間耽擱太長，大大超過了原來的計劃。大學內外許多任職的工作，以及耗時、耗力、耗神的校內的激劇變化，這一切都極大地妨礙了本書的寫作。更重要的是，本書論題本身的難度不斷要求更為深入的探討和反思。

本書之終於問世，應歸功於下列同事們的無私努力：我的助手科列特 (Giancarlo Collet) 和克賴德勒 (Hans Kreidler)，他們減輕了我大量的勞動；拉瑙小姐 (Martina Lanau)、特尼森先生 (Wolfgang Thönissen)、珀舍爾先生 (Erich Poschl) 以及馬爾科夫斯基先生 (Brad Malkovsky) 不知疲倦地作了大量具體的技術性工作；我的秘書沃爾夫夫人 (Elli Wolf) 和費希爾夫人 (Renata Fischer)，她們認真細緻地整理了手稿；最後，還要感謝美因茨市 (Mainz) 的馬提亞斯—綠林出版社 (Matthias-Grünewald-Verlag) 的各位合作者。

我現在呈獻給公眾的這部著作，其實遠未完成。但是，又有誰曾經解決了上帝問題呢？儘管本書花了大量時間來評述和總結關於上帝問題的討論，其本身的目的只不過是為這種討論作些貢獻，其他人將會以批判的方式繼續這場討論。如果本書有可取之處，那麼，的確在處理本書主題時，偉大的奧古斯丁——從他那裏我學到

了許多，雖然我經常敢於違忤他的思想——的這些話值得引用：「如果我的讀者完全分享我的信念，讓他與我同行；如果他分享我的疑惑，讓他與我一起探索；如果他自覺在錯謬中，讓他返回我這裏；如果他發現我陷入迷誤，讓他呼喚我回歸正途。讓我們以這種方式沿着仁愛之路朝向他，如《詩篇》所描述的『永不停息地追尋他的聖顏』(詩104:4)*」(《論三位一體》，卷一，第3章)。

謹以此書紀念第一個教導我言說上帝的人——我的母親。

於圖賓根
一九八二年使徒馬太節

* 現今的《聖經》譯本為《詩篇》一〇五篇4節。《和合本》的譯文為：「時常尋求他的面。」在希臘語及拉丁語譯本中，第九篇與第十篇是合為一篇的，故有此出入。——編注